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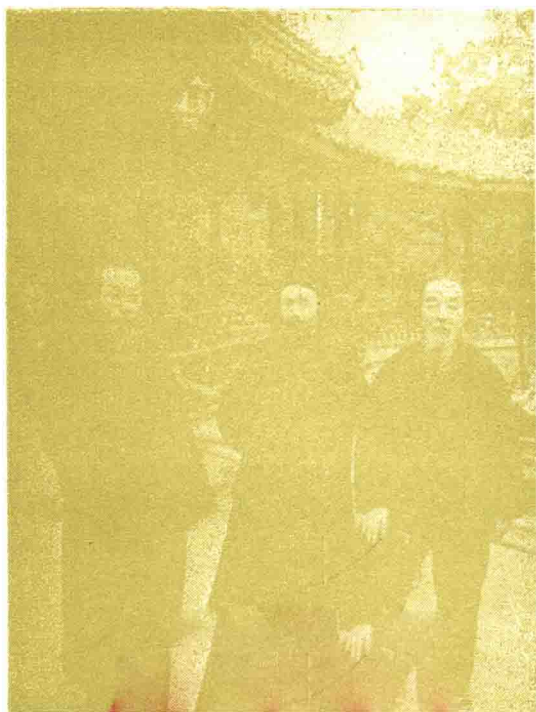
蒙文通学记

蒙 默 编



蒙文通学记

蒙 默 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京) 新登字 007 号

责任编辑: 邓卫中

封面设计: 董学军

蒙文通学记

MENGWENTONG XUEJI

蒙 默 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双桥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 开本 6.5 印张 141,000 字

1993 年 9 月第 1 版 1993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2,000

定价 9.90 元

ISBN 7-108-00518-2/K·82



蒙文通先生遗像 （摄于一九六三年）

義據通深百越千年傳信史
張皇眇眇春秋三世闡微言

蒙默君輯錄其先德文通先生

與師友之遺墨以及記錄先生治

學精詣之諸篇文稿都為一集將刊行
問世余敬題此將以誌欽慕之至兼
抒懷舊之思

丙寅冬日繆鉞



一代師表，學術精研。
文章道德，培育石生。
尊重前賢，為文紀念。
咸此一集，用廣流傳。

蒙文通先生紀念文集

一九八二年周谷城題



目 录

治学杂语	蒙文通	一
诗、曲遗草	蒙文通	四
博学的蒙文通	汤用彤	四
忆文通	钱 穆	四
我们的蒙老师	杨向奎	五
文通先兄论经学	蒙季甫	五
忆文通先生长馆期间二三事	斯维至	六
含英咀华 别具慧解	萧蓬父	八
——蒙文通先生《理学札记》读后		
深切怀念蒙文通先生	邴家驹	二二
怀念蒙文通老师	洪廷彦	二九
蒙文通先生与《辞海》	汤志钧	三六

文通师论道教

王家佑 一三

山高水长

应永深 一四四

——文通师在先秦史研究上的成就和对后学的教导

精密的考证 科学的预见

童恩正 一五六

——纪念蒙文通老师

文通师论宋史

朱瑞熙 一六七

蒙文通先生传略

虞瑾述 一八五

蒙文通先生已刊著作目录系年

邵恭录 一九四

治学杂语

蒙文通 遗稿

象山言：我这里纵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又说：人当先理会所以为人，若不知人之所以为人，而与之讲学，是遗其大而言其细，便是放体流弊而问无齿诀。不管做哪门学问，都应体会象山这层意思。

一个心术不正的人，做学问不可能有什么大成就。

学生总得超过先生。如不能超过先生，纵学得和先生一样，还要你这学生作何用？

孟子说：「观水有术，必观其澜。」观史亦然，须从波澜壮阔处着眼。浩浩长江，波涛万里，须能把握住它的几个大转折处，就能把长江说个大概；读史也须能把握历史的变化处，才能把历史发展说个大概。

做学问犹如江河行舟，会当行其经流，乘风破浪，自当一泻千里。若苟沿边逡巡，不特稽迟难进，甚或可能误入洄水沱而难于自拔。故做学问要敢抓、能抓大问题、中心问题，不要去搞那些枝枝节节无关大体的东西，谨防误入洄水沱。

以虚带实，也是做学问的方法。史料是实，思维是虚。有实无虚，便是死蛇。

读基础书要慢点读，仔细读。不仅是读过，而且要熟。更不在多，多是余事。只熟也还无用，而是

要思。但思并不是乱出异解，不是穿凿附会，只是能看出问题。

读史，史书上讲的尽是故事，切不可当作小讹读，要从中读出问题来，读出个道理来，读出一个当时的社会来。否则，便不如读小说。

中外进行比较，是研究历史的一个重要方法。写《古史甄微》时，就靠读书时学过些西洋史，知道点罗马、希腊、印度的古代文明，知道他们在地理、民族、文化上都不相同。从这里受到启发，结合我国古史传说，爬梳中国古代民族可以江汉、河洛、海岱分为三系的看法，从而打破了关于传说时代的正统看法。学者或不以为谬，后又得到考古学上的印证。后来喜读汉译社会、经济各家名著，也常从正面、反面受到启发。所写一些文章虽未明确写上这点，但在考虑问题时常常是从这里出发的。

读书贵能钻进去，并不在于读罕见的书，要能在常见书中读出别人读不出来的问题。宋刻元槧并不足贵，章太炎就常说他是读洋板书的人。

中国地广人众，而能长期统一，就因为有一个共同的传统文化。欧洲较中国小，人口较中国少，反而长期是个分裂局面，就因没有一个共同的传统。中国文化，说到底就是儒家思想。要把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讲清楚，离开了儒家思想是不行的。

学问贵成体系。但学力不足，才力不够是达不到的。体系有如几何学上点、线、面、体的「体」。清世学者四分之三以上都是恒钉之学，只能是点。其在某些分支上前后贯通自成系统者，如段玉裁之于文字学，可以算是线，还不能成面。如欧阳竟无先生之于佛学、廖季平先生之于经学，自成系统，纲目

了然，但也只限于一面。能在整个学术各个方面都卓然有所建树而构成一个整体者，则数百年来盖未之见。做真学问者必须有此气魄。

有些著作，看似零散，无系统，其实是自有系统的。如顾炎武之《日知录》，赵瓯北之《廿二史札记》，就可说是自成体系的通史，只不过没有把人所共知的史实填充进去而已。然清人札记之能与二书相比者盖鲜。

欧阳先生尝言：读俱舍三年，犹未能通。于沪上见沈乙庵，沈谓：君当究俱舍宗，毋究俱舍学。归金陵，觅俱舍前诸书读之，又觅俱舍后诸书读之，又觅与俱舍同时他家诸书读之，读三月而俱舍之义灿然明白。盖自前后左右之书比较研读，则异同自见，大义顿显。章太炎先生尝言：近人读书尚多未至「不懂」处。旨哉斯言。能如欧阳大师之三年犹知其未能通者鲜矣。大师读俱舍之法，用于它书，何独不然。

做学问必选一典籍为基础而精熟之，然后再及其它。有此一精熟之典籍作基础，与无此一精熟之典籍作基础大不一样。无此精熟之典籍作基础，读书有如做工者之以劳力赚钱，其所得者究有限。有此精熟之典籍作基础，则如为商者之有资本，乃以钱赚钱，其所得将无限也。

每一学问必有其基础典籍：清代汉学，不离《说文》，今古文学，则不离《五经异义》、《白虎通义》；宋学则一《近思录》；文学则《昭明文选》、《文心雕龙》。此学者之所能知。治史则当以《文献通考》为基础，则世之学者鲜能首肯者也。

昔自沪归金陵，过苏州谒章太炎先生，时陈柱尊等侍先生，无锡国专唐蔚之邀先生游无锡，先生嘱同往。时人多言先生言谈难会其意，盖先生学问渊博，谈常牵涉过广，而听者往往不能蹊其思路而从之，故有难懂之感。行间，先生每喜与余谈论，常命近坐，虽饮食亦时命坐旁。听夕论对，将十余日，每至废寝忘食，几于无所不言，亦言无不罄。徐以启先生曰：六经之道同源，何以末流复有今、古之悬别？并研初说今为孔氏改制，古为从周，此一义也；一变而谓今为孔学，古始刘歆，此又一义也；再变说一为大统，一为小统，则又一义也。仪征虽不似井研明张六变之旨，而义亦屡迁。见于《明堂考》、《西汉周官师说考》，或以今古之辨为邦鄙、维岳之异制，或又以为西周、东周之殊科。诸持说虽不同，而于今、古学之内容乃未始有异。要皆究此二学之胡由共树而分条已耳。凡斯立义，孰为谛解？章氏默然久之，乃曰：今、古皆汉代之学，吾辈所应究者，则先秦之学也。章氏之说虽如此，然古今文家，孰不本之先秦以为义，则又何邪？余于此用心既久，在解梁时，比辑秦制，凡数万言，始恍然于秦之为秦，然后知法家之说为空言，而秦制其行事也；孔孟之说为空言，而周制其行事也；周、秦之政殊，而儒、法之论异。既见乎秦制之所以异于周，遂于今学之所以异于古者，亦了然也。乃见周也、秦也、春秋一王大法也，截然而为三。于是有《儒家政治思想之发展》之作，以见秦、汉之际之儒生为与孔孟有别之新儒家，实为战国以来诸子学术发展之总结。然此篇虽于汉师礼说与西周旧典之异同论之綦详，而于此新儒家出入百家之故则犹未暇论及。后集《儒学五论》及撰《孔子与今文学》时，始略论「儒分为八」即儒家之出入百家者，八儒之书，多存传记，汉师言法夏、法殷、制备四代即新儒家之有取于诸子（本欲详论之而未

果），故西汉师儒本有歧义，称制临决，乃趋一致。至于刘歆，乃创古学，而称已先立学官者为今学，而今、古学之纷争乃起。于是知廖、刘二师推今、古之歧异至于周、孔皆非情实，章氏言今、古止为汉代之学固是，然其离汉师于先秦又未必是也。余沉思今、古事，历久不得通，走于四方，博问故老，亦未足祛其积惑，旁稽子史，间有会心，乃渐以得解，然前后已逾四十余年，甚矣为学之难也。

读宋、明理学书，不能当作是学知识，而要当作是学道理，读时应顺着书中所说去体会其道理，要在能懂，不可求快。初读时宜读选本，周汝登《圣学宗传》、孙奇逢《理学宗传》都可（《明儒学案》每家份量稍重，《宋元学案》更重，不宜初学），能读懂哪家，能理会其道理者，不妨多读几遍，然后再读全集。通一家后，再如前法选读他家。总之，选自己有兴趣的，能读懂的来读，而不要勉强硬读。只有这样读，才能真有所得，才能作到「心知其意」，深刻理解。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能深刻懂得古人何所道，是谈不到分析批判的。

读中国哲学，切不可执着于名相，因各人所用名词术语常有名同而实异者，故必细心体会各家所用名词术语的涵义，才能进行分析比较。如果内涵不清，仅就名相上进行分析，皮毛而已，是不着实际的。

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是一部好书，我写《周秦少数民族研究》，基础就是这部书，很多现象它都看出来，材料也提出来了，就是没能把问题点透，缺乏系统。我只在这基础上前进了些，增添了些后起之说。

几十年来，无论是讲课、写文章，都把历史当作哲学在讲，都试图通过讲述历史说明一些理论性问题。唐君毅说：「你每篇文章背后总觉得另外还有一个道理。」丁山说：「你每篇考据文章都在讲哲学。」这虽显有推崇之意，却也符合实际。

讲唐史以《通典》最善，讲宋史以《通考》最善。因为它们都是通史，从知汉、晋，以知唐、宋。正史局限于一代，不知古，亦不能知今。两书都是有所为而作的私史，不比虚应故事的官书。吕伯恭最为知古，但他言古必及今。陈君举最为知今，但他言今必自古。必须通观，才能看得清历史脉络，故必须搞通史。但又必须在一段上有深入功夫。只有先将一段深入了，再通观才能有所比较。要深入一段，最好选在唐以后，因其史料较为丰富。

高齐时尊世族，如卢、李之流，而又专任鲜卑，汉人不得为兵，民族矛盾较大。而宇文泰入关则未形成世族，且多用汉人为兵，民族矛盾较小，故能自弱以渐强，进而灭齐，又进而弱梁、陈，至隋而成一统。

《册府元龟》纂于北宋，其中溢出正史之材料至多，特以六朝、隋、唐、五代多世所不见者，可补史缺。但其书系分类编辑，类别虽细，亦不尽合今日所需，故不可仅根据类目查检，而应普遍查。《通鉴》自六朝以下，亦多溢出正史，《册府》当与相若。伯希和、沙畹等立论多取材《册府》。

嘉庆《四川通志》据正史列蜀人名氏，不见于正史者则多佚而不载。刘鉴泉据宋人文集录出多人。然刘所见宋人文集有限，《四库珍本丛书》即所未见，故可于刘所见集外更补集之。他如《舆地纪

胜》、《寰宇通志》均记有蜀人事，亦可用以补之。

宋有历朝实录、国史，李焘《长编》所引至多。元初修宋、辽、金之史，为时不过二三年，实非修史，乃抄史耳。故《宋史》应基本上保存了宋国史的原貌。可用《长编》互校，《长编》称「本传」者即国史之列传，称「本纪」者即国史之「本纪」，可用以考校究竟保存多少国史的原貌。

《周官》一书貌似规模宏大，职官分明，故后世有「周公致太平」、刘歆伪造之说。然细究其实，亦殊混乱，如选举不尽属大宗伯，军事不尽属大司马，冢宰所主则多为王朝内府之事。若再细审之，则各官职分之重复者亦复不少。可见其实非系统完整之理想制度。至其所反映之社会制度亦与战国以后之实况不合而颇与西周相符（别有专文），皆可证其为就旧日之档案整理而成者。

言汉学，必先明其家法，然后乃能明其学说，又必跳出家法，然后乃能批判其学说。如惠栋是懂家法的，张惠言之于《易》，庄存与之于《公羊》，都可说是明于汉学家法的。戴东原却不懂家法，近世之崇戴者，也多不懂家法，故虽大讲汉学，而实多梦呓。

章太炎颇推重孙诒让《周礼正义》、黄以周《礼书通故》二书，然二书路数则不同。孙为汉学路子，纯宗郑玄，然信之太过。黄以周则不纯为汉学，也讲宋学，以宋学方法讲汉学则时有臆说。然其书又多用林昌彝《三礼通释》，而其下结论则较林为精，林书则为《三礼通考》路子。

唐人学术气度宏大，偶失之粗疏，而宋人学术深细。宋人读唐书，见其粗疏多失，起而纠之，自然趋于深细，如《元和郡县志》即多失，宋地理书则多所是正。

唐之骈文形成四六，唐之诗形成格律，佛学则有科判。看来总有一个架子。

任何思想总是时代的产物，是根据各时代的问题而提出的。时代一过，形势变了，这种思想便失去其意义，便消逝了。

魏晋的佛学，完全是印度佛教与中国思想相结合的产物，故与印度之佛教异。唐人觉其非印度之教义，玄奘亲往印度求法，所取回者为真印度佛教，但与中国条件不适应，再传之后遂绝，而所流行者则仍为中国化之佛教——天台、华严等宗，及至禅宗出现后，与中国思想之结合愈紧密，而竟完全取代前此佛教各宗。

孙明复讲《春秋》大一统，盖针对唐末五代之藩镇割据而发，故其说得以不脛而走。胡安国《春秋传》大攘夷，则就南宋形势言之，故其书终宋之时代三传行世。

一个学派总是有自己的理论，清代汉学的理论何在？而汉代学术，无论是今文家或古文家，都是有自己的理论的。戴震、焦循虽有理论著作，而又和他的整个学术脱节。所以，清代汉学到晚期非变不可，不变便没有出路。

大学以上的学生，主要是学方法。在听课时，应跟着先生的逻辑思维的发展而发展，体会先生是怎样思考问题的，不应要求先生跟着学生的逻辑思维走。假如那样，学生还学什么？

写一篇文章，总要经得起时间考验。一篇稿子写好，最好放个二三年，能经得住二三年的考验，再发表也不晚。在这段时间也可作些补充修改，使更完善些。

明代学者所见古文献远较清人为多，他们常常把这些佚文辑为一帙，刊刻流通。但由于他们在方法上不尽严谨，常有杂凑窜改之事，故清人常以伪作视之，而不屑一顾。实际上这些东西常常都是有根据的，若能有分析地加以使用，是可以化腐朽为神奇的，如明代所传沈约注《竹书纪年》就是一例。

古史辨派兴起后，学者们常常爱说这是伪书，那也是伪书，先秦旧籍《诗经》而外几乎无非伪书。但是，说是伪书，总得找出它作伪的原因。若找不出，是不足服人的。先秦文献不能也不必确指为谁所作，这些作品在流传中又常常都有窜改、增补，但其主体仍不失为先秦旧物。如《尚书》的《尧典》、《禹贡》，若谓其为虞、夏时作品，当然不对，但必谓其创于战国晚期则又未必。其经过辗转传绎的痕迹还是较为清楚，「若稽古帝尧」，就表明是后人的口吻，但文章的基本内容应当还是远古相传的。

《叔孙通传》：「二世召博士诸儒生，问楚成卒攻陈。」博士诸生三十余人前曰：「人臣无将，将即反，罪死无赦。」臣瓚曰：《公羊传》曰：「君亲无将，将而必诛。」知臣瓚意前对者以公羊学为秦博士也。《史记·正义》（《会注》本）引《陈留风俗传》云：「园庚，字宣，明《公羊春秋》，为秦博士。」园又作圆，作辕，豈辕固生之先欤！是此博士三十余人而对者，盖辕宣也。即商山四皓之一。见《史记》之《索隐》、《正义》。

《韩非》言：「管仲毋易齐，郭偃毋易晋，则桓、文不霸。」知齐、晋霸制，更张周礼。成齐桓之法者管仲，成晋文之者则郭偃也。《商君书·更法》征郭偃之法曰：「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则郭偃所倡议，商君变秦法征此二语，肥义主胡服亦征此二语，知其影响于后来者亦巨矣。而班固以